

口述歷史與當代香港史志的編纂

劉智鵬

嶺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美國華盛頓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摘要

香港自九七回歸後本土意識興起，當代香港史志研究漸受歡迎，口述歷史成為建構香港歷史的普及工具。近年香港史志發表的研究成果中，約三分之一建基於口述歷史；說明口述歷史已經在相當程度上為香港當代史志的編纂開拓了新方向。本文旨在檢視口述歷史在香港史學界的操作概況，並探索口述歷史在當代史志編纂上的作用。

關鍵字：口述歷史、當代史志

壹、當代香港史志研究的社會背景

香港是十九世紀中期才開發的城市，至今只有約一百六十多年的歷史。就時間的長度而言，香港比兩岸四地任何一個主要城市的歷史都要短淺；但從社會發展的深度和廣度而言，香港早已超越同區域的許多城市，躋身國際大都會之列。這種看來並不統一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香港史的研究上：香港歷史短，因此沒有得到主流歷史學者的青睞；但香港是遠東地區舉足輕重的金融中心，它的動態又引起社會學者深入探索的興趣。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史的建構經歷了冷熱相間的幾個階段，至近年方漸趨興盛。¹

香港史研究的發展，其實與香港歷史的步伐互相呼應。香港由開埠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百年間，華人雖然一直佔本地人口九成以上，但從未形成一個帶有「香港」意識的社會。戰後隨著中國內戰和政局的轉變，香港成為中國內地人移居的主要目的地。香港的人口在短短十年之間以百萬計增加，香港社會即使再次受英治政府管治，但面貌與精神已經與前大不相同。中港兩地的政治隔閡，使這批新來的移民無法回歸內地的原居地，只好以港為家，落地生根；他們在香港生育的後代也就成為具有真正意義的「香港人」。²從戰後至1960年代中期，香港的人口激增三百多萬，香港亦從商港演變為城市。「六七暴動」之後，英治政府意識到香港社會不再是華人謀生的場所，而是實實在在的生活空間，因此必須調整過去輕視華人的施政方針。在政府政策與社會運動的相互作用下，「香港人」的身份自覺逐漸在1970年代形成，對日後香港社會的發展帶來深遠的影響。³

九七回歸之後，本土運動逐漸在香港社會萌生，引發點是市區舊建築物

1 香港史的研究動態可以參考蕭國健，〈九十年來之香港史研究〉，載周佳榮、劉詠聰主編，《當代香港史學研究》（香港：三聯書店，1994年），頁332 - 342。

2 關於香港人的時代分層，參閱呂大樂，《四代香港人》（香港：進一步多媒體，2007年），頁27 - 49。

3 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80-196.

的存廢之爭。香港政府早在回歸前設立土地發展公司，專門負責重建舊社區的工作，亦即拆除舊建築重新發展。這些在英治時期未有引起公眾關注的事情在回歸後觸發了極大的社會阻力。年輕人從香港破舊立新的發展模式中看到本土文化的流失，於是走至街頭，以語言和行動阻止重建的工程。2006年保衛中區天星碼頭的行動是本土運動的第一波，「本土」、「保育」、「公共空間」等概念亦迅即成為社會議題的關鍵詞。隨之而來的保衛皇后碼頭行動催化了整個運動的發展；在一片反對聲中，被官方的古物諮詢委員會評為一級文物的皇后碼頭最終被拆，埋下政府與本土運動支持者往後的長期鬥爭。隨之而來的戰場有荷里活道警察宿舍、中央市場、高鐵、菜園村、舊政府總部西座等。無論政府或者本土運動陣營，都極力爭奪這些項目的話語權，結果使文物保育和本土歷史變成熱門的社會議題。⁴最近兩年，舊政府總部西座和景賢里兩個項目的討論進一步發展成為全城關注的焦點，政府亦罕有地就這兩個項目向市民徵詢意見。在這種形勢下，政府和本土運動陣營都要在歷史資料中尋找權威論述以支持自己的立場，香港史研究於是迅速成為一個熱鬧的園地。近幾年香港史的介紹和陳述經常在各種形式的媒體上展示；香港史的知識和片段正式納入大中小學的課程之中；香港的大型書店亦紛紛增設「香港研究」的專櫃，集中銷售與香港有關的書刊。

貳、口述歷史是當香港史志研究的重要工具

口述歷史是最古老的歷史形式，也是史學工作者常用的工具。通過口述歷史，史學工作者可以直接走進人類的生活經驗之中尋找文字以外的歷史足跡。古代地方事務耳口相傳，缺乏文字紀錄；地方史志記錄地情人事，往往需要口述資料補充。踏入二十世紀，口述歷史漸漸在史學領域之中發展成

4 黃燕雯，〈我係香港人！本土運動的生成與流變〉，《明報》，2013年8月26日，版D4。

一門獨立的學問，並且與現代地方史志的編纂發生密切的關係。地方史志重視收集當代的信息，但歷史的沈澱和提煉需要很長的時間，社會上未必有充足的資料可供使用，口述歷史可以彌補這方面的不足。香港近年有不少學者文人注意到這方面的問題，並且格外關注口述歷史在搶救歷史上所起的作用。⁵

香港在戰後迅速發展為國際城市，但歷史資料的累積無法追上時代的步伐，不少歷史印象仍然只存於民眾的記憶之中，口述歷史於是成為重構這段歷史的重要工具。香港回歸之後，社會上興起尋根懷舊的熱潮，香港史學工作者對本地史研究的興趣日濃，口述歷史這種工具也愈來愈受到重視，並且漸漸在主流的歷史研究方法之外自成系統。文化學者邵家臻指出，口述歷史的精神不是「口述」，而是「誰的口」和「誰來述」。他認為口述歷史特別要揭露在主流歷史之外的另一個未曾述說的故事。⁶專研婦女史的陳順馨認為歷史往往忽略年輕人，通過少女的口述歷史，可以有力的把年輕人的信息傳播。⁷從事媒體工作的黃啟聰也主張通過口述，讓更多人的聲音被聆聽，然後轉化為文字為尋常人充權。⁸教育學者蔡寶瓊也看出口述歷史的作用是讓普通人直接發聲，凸顯基層的本體性，發掘個人與社會的對話，豐富本土歷史的內容。⁹資深報人葉輝則憂慮香港變成「通屬城市」（Generic City），從而失去歷史、記憶、文化和性格；因此他覺得口述歷史格外珍貴。¹⁰今天的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幾年前也曾經鼓吹用口述歷史的方式，整

5 例如張薇，〈藝穗會：尋找消失的密室〉，《香港經濟日報》，2004年12月8日，版C5；陳天權，〈衙前圍村〉，《大公報》，2006年11月29日，版C5；吳志森，〈口述歷史〉，《明報》，2007年8月30日，版D7。關於香港口述歷史的理論與實踐，參考王惠玲，〈補白、發聲、批判、傳承：香港口述歷史的實踐〉，《鄭州大學學報》，2010年4期（2010年），頁11-14。

6 邵家臻，〈社工口述歷史〉，《明報》，2005年10月15日，版K11。

7 〈陳順馨教授專研女性口述歷史，從阿婆到少女了解香港文化〉，《成報》，2006年3月28日，版F6。

8 黃啟聰：〈口述監獄史〉，《明報》，2008年3月30日，版P32。

9 俞若玫：〈勞動在手，公義在心——《千針萬線》的力度〉，《香港經濟日報》，2008年2月25日，版C5。

10 葉輝，〈基建和建築的想像〉，《明報》，2007年10月28日，版P5。

理八十年代至回歸前所發生的事，讓一些不了解這段歷史的人閱讀。¹¹《文匯報》更公開呼籲全港市民參與口述歷史，擴大收集有關香港歷史的口述資料，目標是建立一個屬於香港人的口述歷史檔案館。¹²在社會各界的推動和參與下，香港近年在口述歷史的發展上取得不少驕人的成果，而且發掘了不少以往從不見於正統歷史論述的社會史資料。¹³

參、近年香港口述歷史的發展與成果

一、政府與政治

政府和政治的著述一般以檔案為研究的基礎，但涉及現代部分，亦不乏口述歷史的成果。張家偉早於回歸後不久發表《香港六七暴動內情》（2000），以口述紀錄與檔案資料互證，揭開香港一段敏感時期的歷史。此後有劉潤和的《香港市議會史1883 - 1999：從潔淨局到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2002），為香港市政機構的存廢作出總結。至於陳敦德的《香港問題談判始末》（2009），則利用了大量參與中英談判期間中方代表官員的談話，從香港人較少採用的角度回顧當年與香港人息息相關的一段歷史。何家騏、朱耀光的《香港警察：歷史見證與執法生涯》（2011）以訪問紀錄為底稿，展示執法人員真實的工作情況。張家偉重訪六七暴動的新作《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2012），進一步以檔案和訪談紀錄透露這件重大歷史事故的面貌。馬嶽《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

11 〈梁振英倡結集回歸口述史〉，《大公報》，2007年3月7日，版A8。

12 〈重組香港回憶，全民「出口術」〉，《文匯報》，2009年1月8日，版C3。

13 例如公認為代表香港飲食文化的「茶餐廳」就從來沒有正式的文獻記載，這類型的社會史只能以口述歷史的方式處理。參考〈港式茶餐廳可申報非物質遺產〉，《文匯報》，2007年4月12日，版A6。

（2012）的出版，是香港近年民主運動興起的時代產物。¹⁴

二、地區發展

其實早在香港回歸前後，香港十八區區議會已經興起一股編修地區風物志的熱潮，並且在資料收集的過程中用上不少口述歷史的方法。風物志是地域研究的範疇，在某種程度上屬於社區口述歷史（community oral history），也是香港近年成果最豐富的口述歷史類別；代表作品有何家騏《深水埗現況與發展》（2000）；區志堅《馬鞍山風物誌：礦業興衰》（2002）；劉智鵬《屯門風物志》（2003）；沙田區議會《馬鞍山風物誌：鞍山歲月》（2003）；郭少棠《東區風物志：集體記憶社區情》（2003）；游子安《黃大仙區風物志》（2003）；梁炳華《香港中西區地方掌故》（2003）；香港教育學院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習中心《葵青：舊貌新顏，傳承與突破》（2004）；劉潤和《九龍城區風物志》（2005）；梁炳華《香港離島區風物志》（2007）；蕭國健《大埔風物志》（2007）；梁炳華《觀塘風物志》（2008）；卜永堅、廖迪生《大埔傳統與文物》（2008）；梁炳華《南區風物志》（2009）；鄭敏華《深水埗故事2：108個深水埗人訪談啟示》（2010）；鄭敏華《追憶龍城蛻變》（2011）；張潔盈、楊樂平《埗城人語：社區口述歷史戲劇計劃——深水埗區》（2011）；梁炳華《香港中西區風物志》（2011）；馬木池《西貢歷史與

14 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香港：太平洋世紀，2000年）；劉潤和，《香港市議會史1883 - 1999：從潔淨局到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香港：康樂文化事務署，2002年）；陳敦德，《香港問題談判始末》（香港：中華書局，2009年）；何家騏、朱耀光，《香港警察：歷史見證與執法生涯》（香港：三聯書店，2011年）；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年）；馬嶽，《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2年）。

風物》（2011）。¹⁵這些由各區區議會出版的地區風物志詳略不一，但總合起來不失為香港史的基本讀物。在風物志內容簡短的基礎上，不少史志工作者選擇以地域中某些地點或板塊作深入的探索，成績斐然。賴建國的《轉變中的人和事：西營盤第一、二街口述歷史紀錄》（2005）集中探索兩條小街的社區變遷。青少年暑期活動委員會也組織中學生到香港的農村去訪問，寫成《老圍的生活人情：口述故事集》（2007）；不但反映出口述歷史已經受到青少年關注，亦通過中學生確實記錄了一個舊社區的生活面貌，對保留歷史作出了貢獻。其他例子包括張兆和《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二：大澳》（2006）；鍾寶賢《商城故事：銅鑼灣百年變遷》（2009）；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活在鹽田仔》（2009）；李香蘭《上·下禾輦》（2009）；劉智鵬《潮起潮落：中英街記憶》（2010）；夏其龍《天主客鹽田仔：香港西貢鹽田仔百年史蹟》（2010）；楊穎賢《文化·地方·人情：灣仔風物誌》（2010）；共融網絡《蓮麻坑·人·物·情：辛亥革命百周年紀念》（2011）；明愛社區發展服務《薄扶林村：太平山下的歷史聚落》（2012）；鄧昌宇《屏山故事》（2012）；阮志《中港邊界的百年變遷：從沙頭角蓮麻坑村說起》（2012）；香港婦女中心協會《大埔居民推動可持續發展：口述歷史集》（2012）；計超《荒原上的遺民：調景

15 何家騏，《深水埗現況與發展》（香港：深水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2000年）；區志堅，《馬鞍山風物誌：礦業興衰》（香港：沙田區議會，2002年）；劉智鵬，《屯門風物志》（香港：屯門區議會，2003年）；沙田區議會，《馬鞍山風物誌：鞍山歲月》（香港：沙田區議會，2003年）；郭少棠，《東區風物志：集體記憶社區情》（香港：東區區議會，2003年）；游子安，《黃大仙區風物志》（香港：黃大仙區議會，2003年）；梁炳華，《香港中西區地方掌故》（香港：中西區區議會，2003年）；香港教育學院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習中心，《葵青：舊貌新顏，傳承與突破》（香港：葵青區議會，2004年）；劉潤和，《九龍城區風物志》（香港：九龍城區議會，2005年）；梁炳華，《香港離島區風物志》（香港：離島區議會，2007年）；蕭國健，《大埔風物志》（香港：大埔區議會，2007年）；梁炳華，《觀塘風物志》（香港：觀塘區議會，2008年）；卜永堅、廖迪生，《大埔傳統與文物》（香港：大埔區議會，2008年）；梁炳華，《南區風物志》（香港：南區區議會，2009年）；鄭敏華，《深水埗故事2：108個深水埗人訪談啟示》（香港：深水埗區議會市區更新及歷史建築保育工作小組，2010年）；鄭敏華，《追憶龍城蛻變》（香港：九龍城區議會，2011年）；張潔盈、楊樂平，《埗城人語：社區口述歷史戲劇計劃——深水埗區》（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011年）；梁炳華，《香港中西區風物志》（香港：中西區區議會，2011年）；馬木池，《西貢歷史與風物》（香港：西貢區議會，2011年）。

嶺的滄桑歲月與愛的軌迹》（2013）；張瑞威《拆村：消逝的九龍村落》（2013）；蘇萬興《衙前圍：消失中的市區最後圍村》（2013）等。¹⁶

三、工商業

經濟和工商業方面，有幾家重量級的企業和家族的口述歷史十分精彩，包括Frank King的*The Hongkong Bank in the Period of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ism, 1941–1984 : from Regional Bank to Multinational Group*（1991）、Elizabeth Sinn的*Growing with Hong Kong: the Bank of East Asia 1919–1994*（1994）、Frank Ching的*The Li Dynasty: HK Aristocrats*（1999），以及郭少棠的《光耀百年》（2001）。這幾本著作講述了香港匯豐銀行和中華電力兩大公司的故事，還有香港僅存的望族李家的歷史，以及李家創辦的東亞銀行。至於平民百姓從事的產業，也可以參看司徒嫣然的《市影匠心：香港傳統行業及工藝》（1996）和余滿華的《做難民，好辛苦；擺到魚，好滿足：十個香港漁民的故事》（2003）。這兩本書所描繪的都是香港日漸式微的行業，與前述的大企業大相逕庭，十分難得。近年涉及工商業的口述歷史發展較為緩慢，代表作品有鄭宏泰、黃紹倫的《香港股史1841–1997》（2006）；陳國賁、陳惠雲的《中港徘徊：香港流動巡迴企業家的故事》（2007）；張展鴻的《漁翁移山：香港本土漁業民俗誌》（2009）；何耀生《香港製

16 賴建國，《轉變中的人和事：西營盤第一、二街口述歷史紀錄》（香港：聖雅各福群會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2005年）；青少年暑期活動委員會，《老圍的生活人情：口述故事集》（香港：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鄰舍層面社區發展部，2007年）；張兆和，《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二：大澳》（香港：三聯書店，2006年）；鍾寶賢，《商城故事：銅鑼灣百年變遷》（香港：中華書局，2009年）；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活在鹽田仔》（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09年）；李香蘭，《上·下禾輦》（香港：三聯書店，2009年）；劉智鵬，《潮起潮落：中英街記憶》（香港：和平圖書，2010年）；夏其龍，《天主作客鹽田仔：香港西貢鹽田仔百年史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0年）；楊穎賢，《文化·地方·人情：灣仔風物誌》（香港：香港小童群益會，2010年）；共融網絡，《蓮麻坑·人·物·情：辛亥革命百周年紀念》（香港：共融網絡，2011年）；明愛社區發展服務，《薄扶林村：太平山下的歷史聚落》（香港：三聯書店，2012年）；鄧昌宇：《屏山故事》（香港：中華書局，2012年）；阮志，《中港邊界的百年變遷：從沙頭角蓮麻坑村說起》（香港：三聯書店，2012年）；香港婦女中心協會，《大埔居民推動可持續發展：口述歷史集》（香港：香港婦女中心協會，2012年）；計超，《荒原上的遺民：調景嶺的滄桑歲月與愛的軌迹》（香港：印象文字，2013年）；張瑞威，《拆村：消逝的九龍村落》（香港：三聯書店，2013年）；蘇萬興，《衙前圍：消失中的市區最後圍村》（香港：中華書局，2013年）。

造, 製造香港：香港工業過去現在未來》（2009）；李培德的《繼往開來：香港廠商75年》（2009）；馮邦彥、饒美蛟的《厚生利群：香港保險史，一八四一 - 二零零八》（2009）；以及黃紹開的《香港的資本：金融業四十年風雲啟示》（2012）。¹⁷

四、教育

教育是香港自戰後以來每年佔政府預算最多的公共事業，但香港教育史的研究卻並未受到相應的重視。反而過去十年有不少口述紀錄，勾勒香港現代教育一些鮮為人知的故事。黃素蘭的《香港美術教育口述歷史：從圖畫堂開始》（2001）述說每星期一課的美術堂如何成為培養專業美術工作者的搖籃。鄭啟濤的《鄉村情懷：香港官立鄉村師範專科學校校史（1946 - 54）》（2004），展示香港戰後一度扮演重要角色的鄉村師範學校，在新界農村地區教育的普及化所起的積極作用。張慧真、孔強生對香港日佔時期的教育感到興趣，成功訪問了當時在艱苦的情況下生活的教師和學生，寫成《從十一萬到三千：淪陷時期香港教育口述歷史》（2005）；並且為香港日佔時期的歷史添補重要的一章。除此之外，學校的歷史也漸漸受到注意，這方面的成果有顧思滿、區士麒、方駿《教院口述歷史》（2002）；香港航海學校舊生會《我們在赤航的日子》（2007）；庇理羅士女子中學《庇理羅士女子中學120年流金歲月》（2010）；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

17 Frank H. H. King, *The Hongkong Bank in the Period of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ism, 1941-1984: from Regional Bank to Multinational Grou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Elizabeth Sinn, *Growing with Hong Kong: the Bank of East Asia 1919-1994*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4); Frank Ching, *The Li Dynasty: HK Aristocrat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郭少棠, 《光耀百年》(香港: 中華電力, 2001年); 司徒嫣然, 《市影匠心: 香港傳統行業及工藝》(香港: 市政局, 1996年); 余滿華, 《做難民, 好辛苦; 擺到魚, 好滿足: 十個香港漁民的故事》(香港: 阿湯圖書, 2003年); 鄭宏泰、黃紹倫, 《香港股史1841 - 1997》(香港: 三聯書店, 2006年); 陳國賁、陳惠雲, 《中港徘徊: 香港流動巡迴企業家的故事》(香港: 中華書局, 2007年); 張展鴻, 《漁翁移山: 香港本土漁業民俗誌》(香港: 上書局, 2009年); 何耀生, 《香港製造, 製造香港: 香港工業過去現在未來》(香港: 明報出版社, 2009年); 李培德, 《繼往開來: 香港廠商75年》(香港: 商務印書館, 2009年); 馮邦彥、饒美蛟, 《厚生利群: 香港保險史, 一八四一 - 二零零八》(香港: 三聯書店, 2009年); 黃紹開, 《香港的資本: 金融業四十年風雲啟示》(香港: 商務印書館, 2012年)。

中國知識份子的追求與命運》（2011）；梁操雅《教育與承傳·2，南來諸校的口述故事》（2011）、《從廣州到香港：真光流金歲月的口述故事》（2012）。其中達德學院一書因為相關資料在達德封校時被銷毀，著者於是走訪校友，以口述紀錄重構中共在香港建立高等院校的一段珍貴歷史。¹⁸

五、文化

文化方面，首先值得一提的是香港電影資料館近十年來編寫的《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系列。該館研究人員訪問了南來及本地的電影人，編寫成《南來香港》、《理想年代：長城、鳳凰的日子》、《楚原》、《王天林》、《摩登色彩：邁進1960年代》、《導演：龍剛》六本口述紀錄，是香港電影史的一套珍貴資料。銀都機構的《銀都六十：1950 - 2010》（2010）是中資電影集團的全紀錄。邱淑婷的《港日影人口述歷史：化敵為友》（2012）通過口述歷史展示香港與日本在電影發展上的緊密合作關係。至於作為香港傳統地方戲劇的粵劇，近年也出版了可觀的口述歷史故事。黎鍵的《香港粵劇口述史》（1993）保留了不少當年粵劇名伶的口述紀錄。其他同類的作品有區文鳳的《粵劇口述歷史調查報告》（2005）；名伶陳非儂口述的《粵劇六十年》（2007）；香港中文大學粵劇研究計劃的《八和粵劇藝人口述歷史叢書（一）、（二）》（2010）。關於香港戲劇的著作有張秉權、何杏楓的《香港話劇口述史：三十年至六十年代》（2001）。電台的廣播劇則有馮志豐的《十八樓C座：為民喉舌“卅”年》（2008），記錄了因六七暴動而創作的長壽節目的時代歷程。陳雲寫的

18 黃素蘭，《香港美術教育口述歷史：從圖畫堂開始》（香港：香港美術教育協會，2001年）；鄭啟濤，《鄉村情懷：香港官立鄉村師範專科學校校史（1946 - 54）》（香港：香港官立鄉村師範專科學校同學會，2004年）；張慧真、孔強生，《從十一萬到三千：淪陷時期香港教育口述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5年）；顧思滿、區士麒、方駿，《教院口述歷史》（香港：香港教育學院，2002年）；香港航海學校舊生會，《我們在赤航的日子》（香港：明文，2007年）；庇理羅士女；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份子的追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2011年）；梁操雅，《教育與承傳·2，南來諸校的口述故事》（香港：香港教育圖書，2011年）；梁操雅，《從廣州到香港：真光流金歲月的口述故事》（香港：香港教育圖書，2012年）。

《一起廣播的日子：香港電台八十年》（2009）也訪問了香港播音界的元老，記錄了早期公營電台的發展概況。莫逸風、黃海榮的《和富大埔：足可圓夢》（2007）和《香港足球誌》（2008），追述當年香港主要大眾娛樂的足球比賽的舊聞和當代球隊的現狀，是非主流的普及課題。謝秉中口述的《拳以載道：香港楊家太極拳見證五十年》（2007）和阿尼的《武者：香港武林口述歷史》（2011），則為香港多年盛極不衰的功夫熱潮留下歷史見證。¹⁹

六、社會面貌

社會面貌是較少史學工作者發掘的題材，因此即使近年有不少口述歷史的成果，但主題以反映社會側面佔多數。大眾化的主題有蔡利民、江瓊珠的《為您做足100分：大家樂集團四十年的蛻變與發展》（2008）；曹疏影的《街坊街里》（2011）和高添強的《九巴同行八十年》（2013）。其他的成果以年長市民的回憶佔多數，例如AT Links的《香港長者軼事重構》（2003）；長者安居服務協會的《我食鹽多過你食米》（2008）；香港家庭福利會編的《想當年，我們在香港的打拼歲月》（2009）；以及香港救世軍油麻地長者社區服務中心的《長者七十二行，行行出狀元：回

19 郭靜寧，《南來香港》（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00年）；朱順慈，《理想年代：長城、鳳凰的日子》（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01年）；郭靜寧、藍天雲，《楚原》（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06年）；黃愛玲、盛安琪，《王天林》（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07年）；郭靜寧、歐陽鳳琪，《摩登色彩：邁進1960年代》（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08年）；盛安琪、劉嶽，《導演：龍剛》（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10年）；銀都機構，《銀都六十：1950-2010》（香港：三聯書店，2010年）；邱淑婷，《港日影人口述歷史：化敵為友》（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年）；黎鍵，《香港粵劇口述史》（香港：三聯書店，1993年）；區文鳳，《粵劇口述歷史調查報告》（香港：懿津出版，2005年）；陳非儂口述，沈吉誠、余慕雲編，伍榮仲、陳澤薈重編，《粵劇六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粵劇研究計劃，2007年）；香港中文大學粵劇研究計劃，《八和粵劇藝人口述歷史叢書（一）、（二）》（香港：香港八和會館，2010年）；張秉權、何杏楓，《香港話劇口述史：三十年至六十年代》（香港：香港戲劇工程，2001年）；馮志豐，《十八樓C座：為民喉舌“卅”年》（香港：亮光文化，2008年）；陳雲，《一起廣播的日子：香港電台八十年》（香港：明報出版社，2009年）；莫逸風、黃海榮，《和富大埔：足可圓夢》（香港：和富社會企業，2007年）；莫逸風、黃海榮，《香港足球誌》（香港：上書局，2008年）；謝秉中口述，倪秉郎筆錄，《拳以載道：香港楊家太極拳見證五十年》（香港：柔靜太極拳研藝社，2007年）；阿尼，《武者：香港武林口述歷史》（香港：次文化，2011年）。

味人生文集》（2011），這幾本作品記錄了香港工薪一族在戰後的工作和生活，是反映社會生活情況的口述歷史成果。同性戀的課題近年引起社會的關注，李芍瑩幾年前已經著手探討箇中的情況，並寫成《情長同志：香港12位「男」同志口述歷史研究計劃 = LBGTQ friendly》（2007）一書，可謂開這類研究的先河。去年蘇美智更走進九個同性戀者的家庭，編寫出《我們的同志孩子》（2012），從父母角度探討同性戀，為這議題打開另一個討論的空間。同樣小眾的課題有何仲詩的《風雲背後：香港監獄私人檔案》（2008），通過囚犯的訪問探討社會邊上的故事。同樣邊緣的故事有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的《「一人一故事」智障人士家庭的抗逆能力》（2008）。至於族裔的邊緣故事則有May Holdsworth的*Foreign Devils: Expatriates in Hong Kong*（2002）和王蒼柏的《活在別處：香港印尼華人口述歷史》（2006），都是關於少數族裔的口述紀錄。醫療衛生領域的口述紀錄有高潔梅的《傷健口述歷史》（2007）；洪嘉的《沙士風雲》（2013）和劉智鵬的《危情百日：沙士中的廣華》（2013）。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隨時會遇上的事情，但整理而成文字紀錄則並不多見。尤其是十年前爆發的「沙士」世紀疫症，因為觸及政府醫療政策與行政的敏感問題而得不到應有的重視。上述兩本「沙士」口述紀錄應該會成為未來的重要參考。最後，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的師生直闖香港社會近年的核心課題，以口述紀錄探討香港人的身份問題，編寫成《誰是「香港人」？：香港小人物誌》一書，從小人物的角度反思社會大課題，見證回歸後香港人的迷惘與思

索。²⁰

七、城市建設

香港地少人稠，城市建設是重大的社會議題。香港建築師學會製作了《熱戀建築：與拾伍香港資深建築師的對話》（2006），從建築界代表人物口中道出香港現代城市建設背後的理念。香港的公共房屋為這城市一半的人口提供居所，也是無數集體回憶的根源。近年舊式公屋陸續清拆，促成幾本公屋口述歷史的出版；包括朱淑芬的《回憶·情：在牛頭角下邨的共同歲月》（2009）；劉智鵬《我們都在蘇屋邨長大：香港人公屋生活的集體回憶》（2010）和鄭敏華《深水埗故事：從社區公共歷史建築看地方發展史及其人文價值》（2010）。²¹

八、婦女

婦女口述歷史在九七回歸後有穩定的發展；通過志願機構的協助，這方面的工作取得驕人的成果。有關的著述有新婦女協進會的《又喊又笑：阿

20 蔡利民、江瓊珠，《為您做足100分：大家樂集團四十年的蛻變與發展》（香港：天地圖書，2008年）；曹疏影，《街坊街里》（香港：明報周刊，2011年）；高添強，《九巴同行八十年》（香港：三聯書店，2013年）；AT Links，《香港長者軼事重構》（Hong Kong: AT Links, 2003年）；長者安居服務協會，《我食鹽多過你食米》（香港：星島出版，2008年）；香港家庭福利會編，《想當年，我們在香港的打拼歲月》（香港：WHY出版，2009年）；香港救世軍油麻地長者社區服務中心，《長者七十二行，行行出狀元：回味人生文集》（香港：明窗出版社，2011年）；李芍瑩，《情長同志：香港12位「男」同志口述歷史研究計劃 = LBGTQ friendly》（香港：香港性學會，2007年）；蘇美智，《我們的同志孩子》（香港：三聯書店，2012年）；何仲詩，《風雲背後：香港監獄私人檔案》（香港：藍天圖書，2008年）；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一人一故事」智障人士家庭的抗逆能力》（香港：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2008年）；Holdsworth, May, *Foreign Devils: Expatriate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王蒼柏，《活在別處：香港印尼華人口述歷史》（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6年）；高潔梅，《傷健口述歷史》（香港：香港傷健協會，2007年）；洪嘉，《沙士風雲》（香港：天地圖書，2013年）；劉智鵬，《危情百日：沙士中的廣華》（香港：中華書局，2013年）；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師生，《誰是「香港人」？：香港小人物誌》（香港：高行印刷，2012年）。

21 香港建築師學會，《熱戀建築：與拾伍香港資深建築師的對話》（香港：香港建築師學會，2006年）；朱淑芬，《回憶·情：在牛頭角下邨的共同歲月》（香港：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香港房屋委員會，2009年）；劉智鵬，《我們都在蘇屋邨長大：香港人公屋生活的集體回憶》（香港：中華書局，2010年）；鄭敏華，《深水埗故事：從社社區公共歷史建築看地方發展史及其人文價值》（香港：深水埗區議會市區更新及歷史建築保育工作小組，2010年）。

婆口述歷史》（1998）、蔡寶瓊的《晚晚6點半：七十年代上夜校的女工》（1998）、薛澤華的《回憶：新來港婦女口述歷史》（2001）、吳俊雄、曾嘉燕的《16+少女口述歷史》（2002）、「香港會愛上女人的女人口述歷史計劃」執行委員會的《她們的女情印記：香港會愛上女人的女人口述歷史：一九五零至二零零四》（2005）、吳曉真的《工廠、廚房、垃圾房：香港女工十五年》（2006）、陳惜姿的《天水圍12師奶》（2006）、湯泳詩的《驀然回首：香港婦女基督徒教會幹事口述歷史》（2007）、黃慧貞、蔡寶瓊的《華人婦女與香港基督教：口述歷史》（2010）。這領域出現了較大量的口述成果，反映出香港社會對女性地位的重視。與此相比，葉穎思的《公說公有理：天北男士口述歷史》（2012）就顯得別具特色。這本書通過訪問十三位居於天水圍北區的男子，探討香港弱勢邊緣地區男性的生活，與上述的女性話題互相輝映。²²

九、勞工

至於勞工的歷史，早在1981年的時候，Janet Salaff已經發表了*Working Daughters of Hong Kong: Filial Piety or Power in the Family?*（1981），專門描述曾經是香港主要生產力的女工與家庭的關係。踏入廿一世紀，式微的工業漸漸成為口述歷史的紀錄對象，這方面的作品有林瑞含的《香港邊緣勞工口述》（2002）；黎婉薇的《香港邊緣勞工口述史》（2002）；蔡寶瓊的《千針萬線：香港成衣工人口述史》（2008）；香港職工會聯盟：

22 新婦女協進會，《又喊又笑：阿婆口述歷史》（香港：新婦女協進會，1998年）；蔡寶瓊，《晚晚6點半：七十年代上夜校的女工》（香港：進一步多媒體，1998年）；薛澤華，《回憶：新來港婦女口述歷史》（香港：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2001年）；吳俊雄、曾嘉燕，《16+少女口述歷史》（香港：新婦女協進會，2002年）；「香港會愛上女人的女人口述歷史計劃」執行委員會，《她們的女情印記：香港會愛上女人的女人口述歷史：一九五零至二零零四》（香港：「香港會愛上女人的女人口述歷史計劃」執行委員會，2005年）；吳曉真，《工廠、廚房、垃圾房：香港女工十五年》（香港：文星文化教育協會；香港婦女勞工協會，2006年）；陳惜姿，《天水圍12師奶》（香港：藍藍的天，2006年）；湯泳詩，《驀然回首：香港婦女基督徒教會幹事口述歷史》（香港：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2007年）；黃慧貞、蔡寶瓊，《華人婦女與香港基督教：口述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年）；葉穎思：《公說公有理：天北男士口述歷史》（香港：香港基督教服務處，2012年）。

《鐵杆起義：千個紮鐵工人的36天》（2008）；陳錦康、班的《在微塵中打拚：香港肺塵病工人口述歷史》（2010）。另外，工會的歷史也通過口述而保留下來，成果有陳惜姿、譚暉、葉沛淪的《不認命的故事：工盟20年》（2010）和方慧賢、黃曉嵐、周文港《工在家國：香港洋務工會九十年史》（2011）。²³

十、人物

香港近年有幾本圍繞九七回歸為主題的口述歷史，十分有份量；包括香港新華社社長周南的《周南口述：身在疾風驟雨中》（2007）；港澳辦主任魯平的《魯平口述香港回歸》（2009）；以及港澳辦副主任陳佐洱的《我親歷的香港回歸談判》（2012）。這三本書講述當年香港過渡時在香港與英國人的角力經過。這種高級別中國官員親述的歷史，應屬絕無僅有，十分難得。香港政壇左派重量級人物吳康民的《吳康民口述歷史：香港政治與愛國教育，1947 - 2011》（2011）則從本土的角度與上述三書呼應，並揭示過去半世紀香港政治發展的一面。除了政治，劉宏的《坦蕩人生·學者情懷：王賡武訪談與言論集》（2000），是香港高等教育發展史之中的一份重要的口述紀錄。同樣重要的還有金耀基的《學思與生涯：金耀基對話錄》（2008）。文化方面的個人訪談有古兆申（2010）、李翰祥（2007）；鍾景輝（2010）；朱克（2011）；謝炳奎（2011）和侯寶璋（2012）。陳有慶口述的傳記《僑通天下：陳有慶傳》（2012），是近年商界少見的口述歷史，書中同時揭示香港作為全球華僑華人樞紐的發展歷

23 Janet Salaff, *Working Daughters of Hong Kong: Filial Piety or Power in the Family?*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林瑞含, 《香港邊緣勞工口述》(香港: 樂施會, 2002年); 蔡寶瓊, 《千針萬線: 香港成衣工人口述史》(香港: 進一步多媒體, 2008年); 香港職工會聯盟, 《鐵杆起義: 千個紮鐵工人的36天》(香港: 鼎豐文庫, 2008年); 陳錦康、班, 《在微塵中打拚: 香港肺塵病工人口述歷史》(香港: 工業傷亡權益會, 2010年); 陳惜姿、譚暉、葉沛淪, 《不認命的故事: 工盟20年》(香港: 香港職工會聯盟、快樂書房, 2010年); 方慧賢、黃曉嵐、周文港, 《工在家國: 香港洋務工會九十年史》(香港: 和平圖書, 2011年)。

程。²⁴

十一、機構組織

機構組織的口述歷史以志願機構或宗教團體為主。趙雨樂、鍾寶賢的《龍城樂善：早期九龍城與樂善堂研究》（2000），記錄了香港六大慈善團體之一的樂善堂的歷史。比樂善堂歷史更早的慈善團體東華三院雖然一直保存大量的資料，包括董事局紀錄和各種往來文書；但為了進一步了解機構在戰後的發展概況，東華三院近年委託香港大學進行了100個訪談，以補充資料文獻的不足。黃秀顏的《冉冉時光：廣華人的承傳與奉獻》（2013）就是東華三院口述歷史計劃的第一本出版成果。宗教團體方面，有劉義章的《盼望之灣：靈實建基50年》（2005）和邢福增、劉紹麟的《天國·龍城：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史（1890 - 2009）》（2010）。²⁵

十二、抗日與日佔時期

日佔時期是近年發表的口述歷史成果之中最難處理的一段歷史。香港日佔時期保留下來的文獻極少，要了解這段歷史必須依靠大量口述資料。²⁶可

24 周南，《周南口述：身在疾風驟雨中》（香港：三聯書店，2007年）；魯平，《魯平口述香港回歸》（香港：三聯書店，2009年）；陳佐洱，《我親歷的香港回歸談判》（香港：香港鳳凰書品文化，2012年）；方銳敏，《吳康民口述歷史：香港政治與愛國教育，1947 - 2011》（香港：三聯書店，2011年）；劉宏，《坦蕩人生·學者情懷：王賡武訪談與言論集》，八方文化企業，2000年）；金耀基，《學思與生涯：金耀基對話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年）；盧瑋鑾、熊志琴，《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1963 - 2003：古兆申訪談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年）；黃愛玲，《風花雪月李翰祥》（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07年）；涂小蝶，《戲劇大師鍾景輝的戲劇藝術之舞台篇》（香港：紅寶文化傳播，2010年）；白耀燦，《台上鄉魂台下硝煙：朱克訪談錄》（香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2011年）；謝炳奎，《不老童軍中港心：謝炳奎傳奇》（香港：快樂書房，2011年）；劉智鵬、劉蜀永，《侯寶璋家族史》（香港：和平圖書，2012年）；劉智鵬，《僑通天下：陳有慶傳》（香港：中華書局，2012年）。

25 趙雨樂、鍾寶賢，《龍城樂善：早期九龍城與樂善堂研究》（香港：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2000年）；黃秀顏，《冉冉時光：廣華人的承傳與奉獻》（香港：快樂書房，2013年）；劉義章，《盼望之灣：靈實建基50年》（香港：商務印書館，2005年）；邢福增、劉紹麟，《天國·龍城：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史（1890 - 2009）》（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10年）。

26 關於香港日佔時期的歷史資料問題，參看劉潤和，〈口述歷史與香港的日治時代——代序〉，載劉智鵬、周家建編，《吞聲忍語——日治時期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香港：中華書局，2009年），頁1 - 25。

惜近年仍然在世的日佔時期倖存者已經所餘無幾，未來恐怕更難以進行有計劃的訪談。因此，現存與這時期有關的訪談紀錄就變得很珍貴。九七回歸後徐月清編寫《戰鬥在香港》（1997）一書，是以口述歷史陳述香港抗日戰爭的先導者。陳敬堂、邱小金、陳家亮合編的《香港抗戰：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論文集》（2005），記錄了東江縱隊抗日戰士的重要訪談紀錄。此後數年至今，東江縱隊的事蹟仍然為人關注，新作有Chan Sui-jeung的*East River Column: Hong Kong Guerrilla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After*. (2009) 以及原東江縱隊粵贛湘邊縱隊香港老戰士聯誼會的《東縱·邊縱香港老戰士抗日戰場回憶》（2013）。Geoffrey Charles Emerson以赤柱集中營為題而寫成的*Hong Kong Internment, 1942-1945: Life in the Japanese Civilian Camp at Stanley* (2008)；以及劉智鵬、周家健的《吞聲忍語－日治時期香港人的集體回憶》（2009），則從兩種生活的角度展示日佔時期的社會狀況，揭開歷史的另一種面貌。日本人和仁廉夫亦把握時機，訪問了不少曾經活在日佔時期的香港人，並於今年出版《歲月無聲：一個日本人追尋香港日佔史迹》（2013）一書，希望藉此披露更多日本侵華的真相，為這段歷史的重構盡最後的努力。無論如何，日佔香港雖然難窺全豹，但通過上述的口述紀錄，使香港這段黑暗的歲月不至於湮沒無存。²⁷

27 徐月清，《戰鬥在香港》（香港：新界鄉情系列編輯委員會，1997年）；陳敬堂、邱小金、陳家亮，《香港抗戰：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論文集》（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004年）；Chan Sui-jeung, *East River Column: Hong Kong Guerrilla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Afte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原東江縱隊粵贛湘邊縱隊香港老戰士聯誼會：《東縱·邊縱香港老戰士抗日戰場回憶》（香港：共融網絡，2013年）；Geoffrey Charles Emerson, *Hong Kong Internment, 1942-1945: Life in the Japanese Civilian Camp at Stanle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劉智鵬、周家健，《吞聲忍語——日治時期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香港：中華書局，2009年）；和仁廉夫著，張宏艷譯，《歲月無聲：一個日本人追尋香港日佔史迹》（香港：花千樹，2013年）。

肆、口述歷史與當代香港史志的建構

上述所列的十二種門類百多種資料，是香港近年公開發售或免費派發的口述歷史書刊的主要成果，非公開流通的未計算在內。口述歷史的其他載體還有視聽資料、報刊文章和網上資源。上述的成果有幾方面的特點值得注意。首先，從出版的年份看，香港口述歷史的發展似乎與近年的本土運動有互為因果的關係。根據粗略的統計，最近五年香港出版的香港研究書刊約有210多種；其中口述歷史的成果約有70多種。這說明口述歷史已經佔香港研究的成果的三分之一，而且有愈來愈普及的趨勢；如果將已經完成但未出版的成果亦計算在內，口述歷史所佔的份額將會更大。²⁸其次，參與口述歷史工作的除了歷史家和學者之外，還有普羅大眾。上述的編著者之中，有接近一半來自非學術的領域；有些口述歷史計劃更是中學生的成果。造成這種現象的結構性原因是香港缺乏歷史學方面的人才，專攻香港史研究的更少，現在活躍於學術界的歷史學者無法處理太多口述歷史的研究計劃。業餘文史工作者未必人人有能力處理複雜的研究課題；相對上口述歷史方便操作而且容易取得成果，於是成為不少人涉足香港史志研究的入門工具。另外，這批口述歷史的出版者往往是執行口述歷史計劃的機構或者規模較小的出版社，反映出口述歷史的非主流性格。

香港口述歷史這幾年蓬勃發展，不但在社會上漸成風氣，也催生了幾個口述歷史的平台。2007年，香港賽馬會贊助一項名為「香港記憶」的文化項目，旨在為香港市民建構一個電子庫藏，收集民間的「集體回憶」。香港記憶的其中一項主要工作就是編製及收藏口述歷史。²⁹2009年，有鑑於口述歷史蓬勃發展的趨勢，香港政府轄下中央圖書館特別建立一項香港口述歷

28 例如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於2001 - 2004年進的「香港口述歷史檔案庫計劃」就是只有庫藏沒有出版的計劃。參看「香港口述歷史檔案庫計畫網站」：sunzi1.lib.hku.hk/hkoh（2013年8月20日點閱）。

29 「香港記憶網站」：www.hkmemory.hk/index.html（2013年8月20日點閱）。

史庫藏計劃；將公共圖書館、香港各間大學和公私營機構的所有口述歷史紀錄和研究成果，集中於一個公共的電子平台；目的是讓市民進入一個開放園地，去了解上一輩人的歷史及文化。³⁰同年中華電力的創辦人嘉道理家族設立了一個部門，處理家族和企業有關的歷史，並且走遍全球訪問有關的成員。這個名為「我家故事」的計劃後來延伸至香港社會發展的其他方面，涵蓋的專題有航空、團體、猶太族群、社區發展等方面，為香港社區保留回憶。這項計劃的重點建設是一個龐大而有系統的口述歷史資料庫。³¹這一年，香港地方志計劃也向前邁進一步，成立了非牟利的香港地方志基金會。從成立至今，基金會下屬的香港地方志辦公室已經進行了多項口述歷史的計劃。³²香港檔案學會也在2012年10月成立「香港口述歷史檔案小組」，作為推廣和討論口述歷史的專業平台。³³

就近年的發展狀況而言，口述歷史肯定在未來的香港史志研究上扮演重要的角色。目前要處理的事情是提升口述歷史的質量和學術認受性。香港學術界使用口述歷史的經驗尚淺，二三十年前只有幾家大學和博物館的少量研究人員做過專題的訪談。口述歷史究竟是一種甚麼類別的研究仍然未在大學的範圍內形成嚴肅的討論，因此亦未得到充分的肯定。³⁴民間推動的口述歷史良莠不齊，百花齊放，有必要在論理和方法上作出調整。這方面的工作對口述歷史的發展將會起到正面的作用，因為口述歷史在操作上必須走入民間方能成事；群眾的記憶就是口述歷史的信息來源，信息的獲取必須通過專業的方法才會有質量上的保證。

無論如何，口述歷史對當代香港史志的編纂只有百利而無一害。大量的

30 〈口述歷史庫藏計劃啟動〉，《大公報》，2009年10月29日，版5。

31 「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網站」：www.hongkongheritage.org/html/chi/index.html（2013年8月20日瀏覽）。

32 「香港地方志基金會網站」：www.hklr.org.hk（2013年8月20日點閱）；另見：〈中央大力支持凝聚港人集體回憶，領大牽頭編《香港通志》〉，《大公報》，2007年2月15日，版A18。

33 「香港檔案學會網站」：www.archives.org.hk/tc/page.php?pagename=hk_oral_history_group（2013年8月20日點閱）。

34 參考王惠玲，同註5。

民間記憶循著這渠道進入歷史資料的範圍，補充香港歷史文獻庫存的不足，為地方史志的研究提供更多的方便。這種發展趨勢亦在某種意義上彌補了公共檔案庫存的缺失。香港政府於1972年設立香港歷史檔案館，但公共檔案的收藏仍有欠系統化；令人費解的是，香港至今一直未有訂立檔案法，以致大量政府檔案被定時銷毀。³⁵口述歷史的成果雖然無法替代公共檔案，但至少可以從民間的角度反映政府施政的社會效果。香港檔案學會香港口述歷史檔案小組的成立，說明檔案學界已經注意到口述歷史的檔案價值。只要口述歷史繼續在民間遍地花開，必然會引起社會更大的回響，對推動檔案法的制訂將會起到積極的作用。

口述歷史是香港當代史志發展的新方向，也是不可或缺的部份；相信在近年史志學界和民間的努力推動下，未來會有更豐富的口述歷史成果可以應用到當代香港史志的編纂上。

35 前香港歷史檔案處處長朱福強近年與熱心人士組成關注小組，向政府游說訂立檔案法，可惜一直不得要領。參看朱福強，〈看政府怎樣「賤待」我們的檔案文獻！〉，《明報》，2011年10月24日，版A30；鄭秀韻，〈前檔案處處長朱福強：梁振英立檔案法可得分〉，《am730》，2013年1月24日，版A14。

參考書目

- 《光明日報》書評周刊編，《口述中國：口述與文獻：誰能還原歷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 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編輯委員編，《唐德剛與口述史：唐德剛教授逝世周年紀念文集》。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
- 王惠玲，〈補白、發聲、批判、傳承：香港口述歷史的實踐〉，《鄭州大學學報》，2010年4期（2010年），頁11 - 14。
- 呂大樂：《四代香港人》。香港：進一步多媒體，2007年。
- 周佳榮、劉詠聰主編，《當代香港史學研究》。香港：三聯書店，1994年。
- 游鑑明，《傾聽她們的聲音：女性口述歷史的方法與口述史料的運用》。臺北：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
- 楊祥銀，《口述史學》。臺北：揚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年。
- Leavy, Patricia, *Oral History*,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Ritchie, Donald A., *Doing Oral History*, New York: Maxwell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1995.
- 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 Thompson, Paul Richard,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Oral History and the Compilation of Contemporary Hong Kong History

Chi-Pang Lau^{*}

Abstract

In the post 1997 era, the emergence of a new wave of local movement has contributed to the revival of Hong Kong historical studie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instru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ong Kong local history is oral history. In recent years, about one third of the local history publications printed in Hong Kong were products of oral history. To a large extent, oral history has helped to develop a new direction i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Hong Kong history. This paper aims to review the use of oral history in Hong Kong and examine the role oral history has play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contemporary Hong Kong history.

Keywords: oral history, contemporary history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